

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历史底蕴和实践基础

张波 杨爱萍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之所以能够应时而生, 源于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坚实的实践基础。它的生成既来自中华传统文化的赓续和升华, 又来自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交流 and 借鉴, 更来自党和人民在中西方对比中追求文化革新、文化自强的探索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世界其他优秀文化共同构筑起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深厚历史底蕴, 从而建构起独特的文化生成逻辑。党和人民追求文化革新、文化自强的实践探索赋予了文化制度根本的内在规定性, 为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成熟与完善奠定了现实根基。理清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历史底蕴与实践基础, 才能把中国文化制度的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中国之治的效能,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 社会主义文化制度

中图分类号: G1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46 (2022) 10-0258-08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①, 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对文化领域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制度”做出明确规定, 深刻地昭示了文化制度在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统一思想、凝魂聚魄的关键性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的“推进”“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等用语从侧面表明, 制度的建构必然会经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知所从来, 才能明其将往, 对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特有的历史底蕴与实践基础进行详细解构和剖析, 才能充分释放其潜在的制度威力, 冲破现阶段国家治理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障碍, 为完成“十四五”期间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 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一、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科学内涵

从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建构来看, 国家建设与制度建构的互动从来都是在各个具体制度的相互作用之间展开的。文化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是极为重要且具体的组成部分, “任何比较成功的现代国家建构, 都必然包含深刻的文化革命以及革命后的文化建设”^②。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表现形式,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21FKSB043); 吉林大学科研培育项目 (JDMY2021-107)。

作者简介: 张波,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杨爱萍,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专业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年, 第10页。

^② 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7年, 第262页。

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具有强大的能动作用，“为经济、政治制度的顺利实行提供必要的心理条件”^①。从国家治理的发展历程来看，“社会主义制度是发展着的制度”^②，是中国之治的阶段性产物。它根植于党和人民探索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百年奋斗史，映射了时代的趋向，汇集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思想精髓。回首从器物到技术再到制度的接续创新，在这一历程中逐渐完善而成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凝结着中国特色治理实践的精华，饱含着独具中国气派、中国风气的治国理政思想精髓。从具体的制度体系来看，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是由三个制度、两个机制所构成的完备的制度体系。五大部分蕴藏丰富的内涵，且彼此协调、相互配合，共同构成支撑制度运行的“四梁八柱”，促进文化领域各方面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其中，“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框定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③，是在整体结构中处于根本地位的制度，其他具体的文化制度都由这一根本性制度派生而来，并随着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深化，逐渐丰盈和完善。

二、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历史底蕴

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根植于中国这一古老的东方大国，同绵延不绝的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彰显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独有的文化生成逻辑内含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世界其他优秀文化，以此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厚重的历史底蕴。

1.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文化之“魂”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④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关乎安全保证文化前进方向。忆往昔峥嵘岁月，党领导人民在文化制度的建设历程中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线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得以科学、系统、规范化发展的制胜要义。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日趋健全和完善，中国共产党人又不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建设面临着不同的历史环境和历史任务，但无论何时，马克思主义是党始终不曾忘却的“初心”与高高擎起的思想旗帜。

在文化发展史上，“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⑤，它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在 21 世纪的超卓表现，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与实践，充分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威力与强大生命力。它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并作为理论基石，充分汲取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合理成分，在全面披露资本主义自私本性的过程中凝结成更具完整性和科学性的共产主义学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始终不渝的执政指南。“为什么人”的问题是 国家制度构建和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始终坚持的价值立场。广大人民群众既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力量，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成果的真正享有者。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类劳动实践中阐释文化的含义。从根本上来说，人类文化是随着人类生产活动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因而人是文化的载体。只有“以人为本”，文化的真正内涵才能得以充分体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在文化建设过程中一以贯之的生产创作原则。党为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与权利提供政策性支持和制度性保障，调动

①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261 页。

② 曹泳鑫 《社会主义制度是新中国发展进步的前提和根基》，《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 年第 5 期。

③ 肖贵清、刘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战略意义、逻辑结构、构建路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

④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13 页。

⑤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2 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年，第 65 页。

社会领域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马克思主义主张上层建筑既能对社会性质做出一定的反应,又具有强大的能动作用。文化有优劣之较,只有真正符合客观规律且真正代表人民群众需求的文化,才能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中发挥正向作用。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文艺作品与文化服务的品质。正确处理文化产品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两种效益”和“两个属性”之间的关系,确保发挥文化制度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正确反映和维护作用。

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文化之“根”

文化虽无形,却拥有强劲的韧性和生命力。民族文化经过时间与实践的锤炼和淘洗,最终积淀成为民族的基因。文化基因也因此成为国家和民族持续发展、长盛不衰的精神密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不可或缺之根。纵观历史,“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赓续与弘扬。随着历史的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和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已经凝聚成“文化的DNA”^②,铸就了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深厚根基。优越的国家制度永远不是“飞来峰”,正是由于坚持“从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③,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中汲取丰厚养料与精神力量,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具有巨大的制度威力和治理优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规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发展基础。儒、释、道、法、墨等思想学说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它既饱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追求与思维方式,又通过吸收不同民族的文化精华来丰盈自身,创造性地转化和发展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庞大思想体系,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构筑了思想根基。“大一统”的文化精神将各个派别的思想精华整合在一起,以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无论是否处于分裂时期,各民族之间都能够产生强劲的凝聚力,通过彼此融合形成维护和平统一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承接并延续了“求同存异”“大一统”“兼容并蓄”的传统文化基因,在党的执政理念和各时期的文化政策中无不彰显着中华文化的独特标识。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保存文化之“根”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设的永恒话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④近代中国在列强的侵略之下,进入了传统文化发展的低谷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⑤。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坚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充分汲取养分的本真追求并“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⑥,而是在萃取优秀思想文化精髓的同时,积极调整内容和形式,“有些糟粕必须加以抛弃”^⑦,使传统文化继续迸发出生机与活力,成为推动国家建设和制度建构的根本内生动力。

3. 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文化之“源”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南,中华民族展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并在革命实践过程中催生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革命文化。作为党和群众戮力同心的历史见证,革命文化蕴含深刻的革命理论,积淀了坚定的理想与崇高的信念,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构和完善的源头活水。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4页。

② 范鹏《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4页。

④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1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

⑥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年,第195页。

⑦ 秦宣《关于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几点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6期。

吐故纳新的革命文化生成于中国共产党人高度凝练的斗争史，见证了中华民族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历程。它内在蕴含着中国人民深沉的民族禀赋和崇高的革命信念，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独有的红色基因。毫无疑问，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历次胜利是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必要前提，但这一切同样离不开贯穿其中的革命文化的精神鼓舞和信念滋养。在百年大变局的时代境遇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阻力前所未有的。革命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构建之“源”，依然以中国革命故事中彰显的英勇斗志和顽强精神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坚实底气，党和人民仍然“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①，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发展。

4.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文化之“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面开启了以实现“富强”为目标的现代化探索，既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磅礴的中国力量。中国之所以取得辉煌成就，并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想模式，也不是完全继承传统的发展范式，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带来的强劲动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其中发挥着精神支柱的关键作用。在四十多年的漫漫探索道路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既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又从红色革命文化中萃取了坚毅的民族精神和共产主义信仰，将中国精神与中国价值以全新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文化之“本”。

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构离不开广泛的社会共识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尤其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社会领域的价值取向呈现日益多元的发展趋势。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囊括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内核以及对中华民族精神追求与文化传统的时代性转化，进一步增强了党和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结晶，汇聚着人们共同的理想信念，凝结着现阶段人民群众最广泛的价值共识，是中华民族最根本的文化自信。它为个人修养与精神境界的提升提供价值规范，在多元文化思潮中引导并塑造各类社会化因素，整合社会价值观念，在差异化认知的基础上凝聚起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认同。“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一种能动性的思想体系，依照时代发展要求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注入精神动力，为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构建明确时代方向。

5. 世界其他优秀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文化之“鉴”

“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② 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各个国家和民族在制度体系、价值理念等方面都各自拥有其独具魅力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建设的经验，都是世界文化的必要构成部分。与世界多元文化进行平等交流，充分吸收其中的优质元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丰富和完善的重要经验。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也正是在交流互鉴中广泛学习发达国家的文化建设经验，深刻自查自省才逐渐演化为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

开放性和交融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条重要规律，在多元文明之间的跨界交流中主动学习和借鉴他人的优秀文化成果，是真正推动本民族文化发展长期向好的动力之源。近代初期，虽然由于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学习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治理模式并没有使中华民族真正摆脱水深火热的生活，但也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主动寻求改变的敲门砖。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国家首先面临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先进的政治制度同落后经济文化之间的不匹配性。中国走上了学习苏联经验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早期创造了不可低估的经济成就。随着学习进程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人逐渐体悟到全盘效仿他国经验不是长久之计，开始扬弃原本的苏联模式，并与实际需要相结合，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角色转变，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260页。

三、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实践基础

依据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①是构成制度的三大主体。其中,行为惯例、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等不成文法在制度变迁中起着关键作用。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从萌生至逐渐定型,再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完整表述,之所以能够日益完善并成为“十四五”期间文化强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支撑,不仅在于古今中外优质文化元素的持久涵养使其有厚重的文化积淀,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近代以来党和人民对文化革新、文化自强的探索与实践蕴藏着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内在规定性,为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奠定了重要的现实根基。

1. 坚持党的领导构成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显著优势

“党的领导制度不从根本上确立起来,其他制度就失去了根基。”^②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发扬者、中国文化资源的丰富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传承者。回顾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建设历程,党一经成立就将文化建设纳入宣传工作当中,以确保党领导文化事业制度。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党领导人民在文化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针对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通过印发《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来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促进一系列文化产业的迅速崛起。文化创意、数字出版等产业的快速发展充分彰显出党以实际行动将文化建设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摆在突出的重要位置,把握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谱写出文化建设史上的崭新篇章。

2.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明确了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思想旗帜

在先进知识分子为实现文化革新与文化复兴而苦苦探索时,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中华民族注入了精神动力和价值信仰,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树立了思想旗帜。梳理建党百年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党立国之本,将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建设根本方向的规定性视为“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③。根据特殊的外部环境和内部考验,完善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确保其始终“为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提供思想定力和政治定力”^④。

党和人民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直抵文化和意识形态本质的。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为憧憬的治理目标和价值观。党始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群众领域的广泛传播,围绕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和理论开展了众多有利于推动思想解放的文化实践活动,主动翻译并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逐步提升和完善大众对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信仰的准确认知。无论在何种恶劣的环境和艰难的条件下,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一天都没有停止,坚持开展了一系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武装、教育人民的活动,并获得了良好的教育成效,使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与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进入新时代,面对百年大变局下世界文化格局的深刻调整,党和人民吸取了过去文化实践的成功经验,依然坚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虔诚信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重申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首要地位,以马克

^① 道格拉斯·C. 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页。

^② 齐卫平 《体系与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治理优势》,《行政论坛》2020年第1期。

^③ 《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8页。

^④ 肖贵清、刘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战略意义、逻辑结构、构建路径》,《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回应新的时代挑战，强调其作为一项根本文化制度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的根本指针。

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创了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崭新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发展方略主要是效仿苏联。随着国家建设的逐步完善，中共八大提出“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①，这里的“新文化”是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文化，但真正意义上文化繁荣发展的高潮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反思前期文化建设成功与失误经验的基础上，彻底疏通文化体制发展中的淤滞之处，再次使文化建设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四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在与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体制机制的适应性发展中萌生，并不断自我完善。时至今日，人民需要的外延和内涵不断拓展，新时代对文艺事业也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着新的发展局面。

新时代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随着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迈向新的发展阶段，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文化进步的强大物质支撑，使得“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②，于是，党开始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另一方面，文化与科技的交融为传统文化注入了时代元素，实现了文化内容和传播方式的革新，优秀传统文化释放出新的生命力，极大提升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和力度，对增强群众的文化认同感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文化建设在未来阶段的具体方略指明了目标要求和着力方向。人民群众对高水平文化供给与文化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合理布局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倒逼机制，推动文化生产形成由增加“量”转变为提升“质”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长期以来，市场经济的繁荣使企业获得了更多经济效益，文化产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过分追求经济效益使得社会主义文艺面临着“脱离群众”的危险，“为什么人”“依靠什么人”的根本取向越来越模糊，文化领域出现供给体系与群众需求的不适配问题。为此，新时代的文化建设更关注群众的基本文化诉求，移动阅读服务站、文化惠民平台等文化服务设施在基层社区广泛投入使用，突显出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人民性的根本价值指向。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使文艺事业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新飞跃，为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③ 其蕴含的战略思维、系统观念和历史自觉进一步明确了文化现代化在新环境下的问题导向。

4.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了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设的精神力量

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要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一方面要坚定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则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形成对自己国家和民族长期文化积淀强大的价值认同，从心灵深处铸成主体对自身文化的坚定信仰并能够自觉弘扬，以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创新创造活力构筑起推动文化进步、构建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这是事关文化发展的关键问题。

“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④，这种自信根源于党和人民创造发展奇迹的光辉历史，生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近代帝国主义的入侵打碎了国人的和平梦，中华民族自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屡战屡败的惨痛经历使中国人民在文化自信层面降到最低点，“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⑤，中国社会甚至产生了“全盘西化”的极端论调。直至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0页。

④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50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以来,中国人民才重拾自信,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在党的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以加速度的模式实现了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大幅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文化在经济发展的助推下逐步走向世界,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开设了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使文化自信有了更加坚实的底气。作为文化精神的核心,核心价值观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和根本。它充分反映了人类社会从愚昧到文明的进步程式,形成了人类向往美好生活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在性质和内容上具有极大的进步性和创造性。在各种社会思潮交融交锋和思想意识多元多样的新常态下,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有效整合多元文化与价值观念,使中国社会始终围绕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发展运行,关键就在于以共同的思想基础为立足点,将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作为弘扬主旋律、提升价值自信的主要抓手,从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活力,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输送源源不断的文化资源和自觉担当复兴大任的优秀人才。

5. 舆论监督机制的党性原则规范了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政治方向

从本质上来看,制度也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意识形态的映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核心要义即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属性规定为文化制度定准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诸多外部表征中,党的领导是最重要、最本质的特征,“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①,党性原则贯穿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始终,在制度建设表现为“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②。中国新闻舆论工作自始至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人民利益至上,形成了以党性原则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为确保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政治方向提供了思想保障。

“舆论的力量绝不能小觑”^③,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够大大促进事业的发展,但一旦出现偏差,则会引发不可预知的后果,甚至成为党和人民之祸。细观苏联解体以及北非一些国家爆发的颜色革命便可以发现,这些重大事件首先发酵在舆论领域。因此,重视文化的喉舌与阵地功能、坚持党管文化是维护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安全的首要前提,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笔杆子”与“枪杆子”在革命中的位置同样重要,虽然随着群众主体性的增强出现了文化权力的让渡,但党报党刊“作为组织一切工作的一个武器”^④，“必须姓党，必须抓在党的手里”^⑤，新闻舆论工作必须要以刊登和宣传党的思想为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是经过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锤炼生成的政党，“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⑥，二者是统一的。新闻媒体在宣传党的意志主张的同时，也是在反映群众的心声，为大多数人服务。

当代社会,文化领域的舆论生态和传播方式都已经发生变化,新闻工作极易陷入市场化旋涡,出现一味迎合市场需求的低俗化倾向。而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正确引领,能够有效规范舆论宣传的政治方向,避免出现文化脱离群众的问题。中国主流媒体始终不渝地弘扬主旋律,舆论引导工作发展势头长期向好,伴随技术进步兴起的新媒介也与传统媒介互相融合形成全媒体传播体系,共同致力于构建线上线下有效联动、国际国内双向沟通的舆论新格局。在文化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批综合实力较强、竞争优势突出的主流媒体,为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创造了网上网下一体化的舆论引导体系和舆论传播平台。

6. 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提供了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宝贵经验

任何一种制度的形成都是国家和民族发展史内生演进的结果,都有一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根基。“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优越的制度既需要传承本国思想精髓,又要吸收各国治理经验与文化精华。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96页。

② 何毅亭《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8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1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⑥ 张研农《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人民日报》2013年9月16日,第7版。

社会主义文化制度饱含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标识与深厚的文化内涵，但从它的最初萌芽至最终定型并不是简单的继承传统，而是本着辩证取舍的科学态度将外来文化的优质元素“引进来”，经过与世界多彩文明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才逐渐丰盈成如今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以及向先进民族学习交流并借鉴其经验，都为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重要借鉴。

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积累了浩如烟海的文化财富，至今仍散发着超越时空、国度的非凡魅力。历史上，张骞肩负着文化交流的使命出使西域，实现了中华文化的跨界传播，也将西域独特的文明元素引进中国，成为中华民族最瑰丽的文化财富。与此相类似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活动在中国文化史上出现过多次，影响最为深远的分别是古代佛教文化的传入、近代兴起的西学东渐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点亮了中国的希望之光，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吸收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原则，依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性使其为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科学指导。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华文明与世界各国文明的互动也更加频繁，中华文化和中国价值观正在加快“走出去”的步伐，不断提升其在国际领域的影响力，同时也在吸收引进外国文化有益元素的基础上逐步增强中华文化的比较优势。

总之，任何制度的背后都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文化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其孕育和生成的根基在于长期以来党和人民追求文化革新和民族复兴的社会实践，既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也在中华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的深入互动中不断自我优化。如今，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已经成为内涵丰富、结构完整的完备体系，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文化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促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刘 莉